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

朱奕嵐¹

- 一、生死存亡的決策
- 二、國際政治平衡理論與歷史研究
- 三、策略環境、角色扮演與策略動機
- 四、依附與平衡之間
- 五、結論—趨利與避禍動機雙軌策略反應

國家行為者面臨體系變動時的策略反應，乃國際政治領域理論研究的重要核心主題。特別是以Waltz為代表的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為主軸，相關平衡理論與其批判，構成現代國際政治理論的重要基礎。有趣的是，源出於歷史觀察而以解釋、預測社會歷史變動的諸平衡理論，卻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現了理論解釋與預測無法與真實歷史事件相符的理論闕漏。用以佐證特定理論的歷史案例，也往往被其他學者用來批判甚至是否證該特定理論的依據。已然發生的歷史不可能出錯，唯有可能是研究者對於歷史事件的變動在認識上不充足。基於對諸平衡理論的反省，本文透過對於國際歷史上重要衝突案例的檢視，提出一待進一步檢驗的平衡理論—危險平衡理論。危險平衡理論的主要內容，即在將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動機區分為「趨利」與「避禍」雙軌，並提出下列假說：如國家行為者抱持「趨利」動機，在面臨低度風險時，將採取「依附」策略；在面臨中度風險時，將採取「觀望」策略；在面臨高度風險時，將採取「平衡」策略。如抱持「避禍」動機，則在面臨低度危險時，將採取「躲避」策略；在面臨中度危險時，將採取「屈從」策略；在面臨高度危險時，將採取「對抗」策略。

關鍵字：權力平衡、威脅平衡、利益平衡、危險平衡、策略反應、平衡、依附

一、生死存亡的決策

¹ 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九三九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瓜分波蘭後，因為與納粹德國間已經沒有緩衝區域，蘇聯便開始為將來可能的德蘇衝突進行準備。一九三九年十月，蘇聯已經透過條約的締結，使紅軍得以進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境內的若干重要據點，同時也展開與芬蘭的談判。蘇聯要求芬蘭割讓若干控制芬蘭灣的重要島嶼，以便於能控制芬蘭灣的進出；將位於芬蘭南端芬蘭灣出口的漢哥(Hangö)港租借予蘇聯三十年，以使得蘇聯能加以利用，並與芬蘭灣對岸愛沙尼亞境內的巴達斯基(Paldaski)海軍基地共同對芬蘭灣出口加以控制，以掩護列寧格勒不受封鎖或侵入；針對列寧格勒西北方的卡內里亞地岬(Karelian Isthmus)中的蘇芬國界，蘇聯要求該芬蘭同意將國界線往芬蘭領土方面內縮，距離以從列寧格勒起算的重砲射程之外為原則，以增加列寧格勒西北方面的防禦縱深；針對蘇聯北方重要港口莫曼斯克(Murmansk)的通路保障，蘇聯也要求芬蘭將莫曼斯克西北方的利巴齊半島割給蘇聯。相對的，蘇聯則願意以領土交換來補償芬蘭：蘇聯願意割讓面積大約2,134平方英哩的領土給芬蘭，以補償芬蘭所讓出大約1,066平方哩的領土。換言之，如果依照蘇聯的要求，芬蘭將多獲得大約一千多平方英哩的領土。更重要的是，雙方完成領土交換之後，芬蘭原本不利於防守的南北長而東西短的蜂腰型國土形狀，將因為增加的領土而使得蜂腰部分加寬，更有利於防禦，但芬蘭斷然拒絕蘇聯的要求。經過雙方短暫激烈而未能達成妥協的外交對話，蘇聯隨後動員了十四個師的兵力，分兵由北、中、南全線侵入芬蘭。芬蘭雖然抵抗了三個月，終於不敵蘇聯的優勢兵力而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向蘇聯屈服。芬蘭割讓了中部若干地區以及卡內里亞地岬給蘇聯，並同意修建一條鐵路橫越其中北部與蘇聯的莫曼斯克鐵路相連。簡言之，一九三九年的芬蘭戰爭，乃是蘇聯先用利誘的方式來試圖勸誘芬蘭接受領土交換；在芬蘭拒絕後，蘇聯便以優勢武力來迫使芬蘭做出讓步。蘇聯的北面國境因而獲得更具彈性的防禦縱深，以避免德國假道芬蘭攻擊蘇聯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重要海上通路門戶—莫曼斯克與列寧格勒。衡量雙方的軍力，武器與人員數方面均由蘇聯佔絕對優勢；對芬蘭有利的只有氣候與地形利於防禦與游擊而已。各國均預期芬蘭必然失敗，而雖然開戰初期芬蘭的機動防禦成功的阻止了蘇軍的透入，

但終於在蘇軍連番波狀攻勢後，不支而投降。²

為何芬蘭不一開始便降服於蘇聯而接受條件看來優渥—領土面積增加而不利防守的蜂腰部分防禦縱深也增加—的領土互換要求？芬蘭為何明知螳臂勢難擋車，卻還試圖抵抗蘇聯的軍事脅迫與攻擊？芬蘭為何又在三個月後向蘇聯求和？為何英國、法國、甚至是德國都沒有介入？

「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³ 當一個國家面臨另一個國家直接或間接威脅所造成外在危險的時候，所能採取的策略似不外乎戰、守、走、降而已。策略選擇正確，則戰而得勝、守而得保、走而得避、降而得免；策略選擇錯誤，輕者民殤，重者國亡。由於面臨外在危險時的策略選擇正確是否，關乎國家最高目的的實現—人民的身家性命、國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是「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

但是，即便決策者能夠明確地感受到危險的明顯性與急迫性，也能意識到做出正確決策的必要性，但是否能在適當的時刻做出適切的判斷，卻與主觀的危險與急迫的感知之有無，並沒有必然的關連。何時當戰？何時當守？何時當走？何時當降？策略選擇的困難度、時間的緊迫性以及錯誤決策後果的嚴重性，卻也往往使得處於生死存亡之際的國家，在決策的關鍵時刻，躊躇難定而喪失先機。

國際政治學領域在研究討論國家面臨外在危險的策略反應的相關主題時，Kenneth N. Waltz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以及Stephen M. Walt的威脅

² 依著名軍事戰略思想家李德哈特的觀察，蘇聯在當時的戰略規劃，主要是對應著德國而定。申言之，蘇聯確實是以德國可能的擴張來做為前提，以增加防禦縱深來做為應對主軸。1939年蘇聯之所以願意與德國瓜分波蘭，使蘇聯與德國間的緩衝國—波蘭—消失，主要是因為蘇聯認為波蘭不但無力做為阻擋德國直接攻擊的屏障，反而極可能成為協助德國而侵入蘇聯的矛頭。換言之，如果蘇聯能透過瓜分波蘭的方式來征服波蘭，不但可以收回1914年後失去的領土，還可以由紅軍自己的兵力還防守蘇聯本土與德國間的緩衝區域。除了瓜分波蘭外，蘇聯嗣後對波羅的海三小國與比薩拉比亞的支配，以及本文討論到的芬蘭戰爭，也是基於同樣的戰略規劃。(Liddell-Hart, 1970:Chs. 1, 5)

³ 三國時遼東太守公孫淵叛魏而自立為燕王，魏國遣司馬懿領軍對陣。公孫淵不敵，遣使向司馬懿求降，表示願意以子為質，投降於魏。司馬懿拒絕，並以此句叱之。

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可謂是代表，特別是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更是在近年成為研究者循襲或是批判的焦點。比較特殊的是，Waltz是以國家行為者為體系內的單元行為者，透過經濟邏輯來推導國際體系現象的轉變。雖然Waltz的確引用若干歷史案例來做為其理論結果的佐證，但卻沒有仔細的引用相關歷史證據，只企圖以簡明的變項關係來說明權力平衡的運作（林碧炤，1997：121-123）。

社會科學研究依循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信仰，認為社會歷史變動與自然事物的變動一般，有其既定的法則。而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發現而不是發明此一事物變動的既定規則。只要掌握這一個持續穩定且相對簡單的變動法則，科學研究者—包括國際政治研究者—認為便可以用以描述、解釋與預測事物—不論是自然事物或是社會事物—的變動模式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此一變動的法則，可以從歸納也可以從演繹而來。透過對過去的歷史加以觀察歸納，超越時間與空間而持續出現的行為變動模式就是所謂的社會歷史變動的「沉澱物」，是超越時間與空間而履履持續出現的一種社會行為模式，也就是透過對於跨時間與跨空間的案例樣本觀察所歸納而可能是構成行為法則的一種社會行為模式。⁴ 另一種掌握社會行為法則的方式，是先從個別少數的案例，甚至是透過對於人類行為變動的直觀理解，先推導出合於邏輯與普遍經驗的行為模式，再以此種模式與實證事例來交互檢驗，以提高此一透過演繹得到之法則的普遍性。

換言之，歷史應該被期待，也往往被期待能為研究者與決策者提供解答。研究者與決策者不是積極地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便是消極地希望能規避過去的失敗錯誤 (Reiter, 1996:1-2)。歷史如果不是成為國際政治理論建構的啟發，就是在理論檢驗過程時，成為檢驗理論真確性的唯一依據。企圖建構國際政治理論而毫不考慮歷史證據與發展，是相當困難的（林碧炤，1997：123）。

⁴ 此處的「沈澱物」，是借用著名學者柏雷圖(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的說法。指涉的是存在於社會中的人對於事物的單純的、基本的、概化的態度與信念。此一沈澱物——柏雷圖又經常將之稱為「情緒」——是一種行為情緒的本質，受到社會政治思想主義等干擾——柏雷圖用「剝削」一詞稱之——而呈現出不同的表象。唯有去除這些干擾，人——做為政治社會的主體——的本質，才能被理解。（McClelland, 1998: 645-650）

既然歷史對於國際政治理論建構是必要的，Waltz的理論卻似乎未對相關的歷史案例進行檢視。本文首先便就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以及Waltz的威脅平衡的理論重要內涵以及其是否能解釋重要的社會歷史變動，進行研究討論。事實上以John Vasquez, Paul W. Schroeder, Richard N. Rosecrance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學者與國際歷史學者，均嚴厲地批評Waltz的理論不但不能解釋過去重要的歷史事件，連Waltz對於其自認能佐證其理論的重要歷史事件的認識與理解，也與當前國際歷史研究的結果相左。詳細的討論與引據，請參考本文：二之（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與歷史。

既然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有失之化約甚或是與歷史相悖的情形，本文的另一個重要企圖，便是試圖從重要的歷史社會事實中，歸納出國家行為者面臨外在危險所可能具有的反應模式，以便做為後續研究的基礎。換言之，本篇論文可以說是一個尚未真正開始進入檢證階段的研究構思，只透過目前國際歷史學者以及國際政治理論學者對於重要歷史事件的研究所得，加上作者個人的主觀意見與想像，嘗試透過對於體系失衡前的國家行為者的策略環境、角色扮演、策略動機及策略作為，針對國家行為者面臨因為體系不穩定或失衡的關鍵時刻所做出的策略反應，建立出一套的模型，以利於後續更具通則化的策略反應理論的建構。

此外，本文進行初步觀察的案例樣本，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案例為主。此一案例觀察取向，並不是忽略冷戰之後的國際局勢演變所致。之所以不取冷戰以及冷戰之後的國際局勢或個別案例，主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體系結構，存在著二個重要而前所未有的因素。第一個是核子的恐怖平衡，第二個是國際建制的深化。核子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平衡，使得大國間不再以全面對戰來做為解決彼此紛爭的途徑，也間接使得現代國際局勢呈現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美蘇集團對峙，集團內的小國只要遵循大國的領導，安全可以獲得相當的保障。而由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以及現代國際法的活化，也使得各國能透過集體安全制度的推行與國際組織的協助，不以全面戰爭而以外交折衝的方式來處理彼此的糾紛，維持自我的安全。這也是十九世紀以前各國國際體系所沒有的因素。雖然本文作者也不認為戰爭與武裝衝突自此將從

人類社會中絕跡，但是要觀察國家面臨外在危險的基本策略反應模式，核子平衡以及國際建制的活化，確實可能成為研究上的干擾因素。這也是作者認為在理論建構的初步階段，先以近代以前的國際歷史變動為觀察研究的對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國際政治平衡理論與歷史研究

(一) 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

在討論國家行為者面臨因為體系不穩定(Instability)甚至是體系失衡(Imbalance)⁵所造成的外在危險的策略反應時，Kenneth N. 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以及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理論乃國際政治學領域的主要代表學說。Waltz著眼於力量的失衡，認為國家行為特質是「結弱制強」：當某一國家或集團的力量超越其他國家，其他的國家會自動聚合來與之對抗，以便維持體系的穩定(Waltz, 1979)；Walt著眼於威脅的失衡，認為國家行為者的行為特質是「聯善抵惡」：當某一個國家或集團對體系既有秩序的穩定造成威脅時，其他的國家便會聚集來與之對抗(Walt, 1987)。

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做為結構現實主義的重要核心內容，也是學界論爭的焦點。權力平衡理論的核心主張，即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以及戰爭的陰影籠罩所構成的決策環境下，客觀的力量差距乃決定國家行為者策略的最關鍵的

⁵ 國際體系者，指的是由獨立政治體——部落、都市國家、民族國家或帝國——以相當頻率及規律化程序互動的集合體(Holsti, 1988: 21)。本文將「體系不穩定」(Systemic Instability)定義為：體系內某一或若干行為者的力量變動或是體系內或體系外某一或若干行為者對體系內其他行為者進行挑戰，以企圖改變自己於體系內的權力地位，但由於力量消長現象甫發生、或消長程度不大、或對於整體的既有權力地位關係未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一級強權與其他主要國家以及其他非衝突關係當事人或衝突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各自的國家安全、權力地位或既有利益並未受到嚴重挑戰或傷害。換言之，體系不穩定只是區域性的、局部的、涉及少數非體系強權行為者的衝突狀態。體系不穩定可能會因為衝突的程度與範圍擴大，使得牽連的國家愈來愈多，進而造成既有體系秩序瓦解。「體系失衡」(Systemic Imbalance)則定義為：由國家行為者的互動關係所組成的國際體系原有的權力地位關係狀態，因為體系內某一或若干行為者的力量變動或者是體系內或體系外某一或若干行為者對體系既有秩序進行挑戰，而被體系內行為者認知為是原有體系即將或已然發生全面的變動。此一既有權力秩序產生變動但新的既有秩序尚未成形的時期，即屬於體系失衡狀態。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間德國的增強以及一連串的對外擴張，可謂是此例。在此一時間，整個體系秩序雖然尚未完全傾覆，英法仍保有政治與軍事上的表面優勢，但德國多次的合併與侵略，已然使得整個體系除於不穩定的狀態。最後在德國入侵波蘭而使得各地主要國家均先後被牽連而捲入大戰之中，體系也超越不穩定狀態而徹底瓦解。

解釋變項。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便是與較弱的國家或集團結盟，一同與較強的國家或集團抗衡，以平衡彼我國家或集團間的力量差距，進而避免比自己更強大的勢力出現並宰制體系的運作。雖然看來消極，但Waltz指出在國家行為者彼此猜疑，而以自我能運用的力量等於或大於其他行為者的力量對等狀態來定義自我安全時，如何保持彼我間力量的對等均衡，對於個別國家而言，是至關緊要的(Waltz, 1979: 102-128)。

但是，九〇年代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者與國際歷史研究者透過對個別重要歷史案例的研究，卻發現事實上大部分的國家並不是一開始便如權力平衡理論預期般，加入弱小集團來制衡強大集團：Rosecrance與羅致政(1996)即從拿破崙戰爭研究中，指出歐洲各國在面臨拿破崙的威脅，即便採取Waltz預測的採取平衡策略，也在時機上出現遲延(lag)，而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並沒有解釋此一策略遲延的原因 (Rosecrance, and Lo, 1996: 479-500)。又如Schroeder以法國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做為研究案例，指出在這幾場國際性大規模衝突中，結弱制強的單純權力平衡邏輯，並不是被國家行為者所普遍採用的策略(Schroeder, 1992: 683; 1994a; 1994b: 108-148; 2003)。Schroeder指出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七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普奧二國各別的軍力，在數量與素質上都強過法國 (Rosecrance, and Lo, 1996; Schroeder, 1994b)。但其他各國不是如同威尼斯共和國(Venice)⁶般保持非武裝中立，便是加入力量較強而且積極準備侵入法國的普奧反法同盟。換言之，從行為外觀看來，各國在法國革命戰爭期間所採取的策略，多是以與強者合作或與衝突雙方保持距離來做為主要優先的策略，而不是採取結弱制強的權力平衡策略。以躲避與依附強者為主要策略的情況，也出現在之後的克里米亞戰爭、一九一四至一九四四年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時期之中 (Schroeder, 1994b)。

面對眾多來自於歷史研究的批評，Waltz並沒有承認其理論解釋與歷史研究發現的矛盾，也不承認其理論因為其他學者的批評而有修正的必要：Waltz直指

⁶ 一般對於威尼斯的認識，是一個屬於義大利的著名觀光都市，但威尼斯從一二〇四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開始，乃是地中海區域具有一等一海上軍力與經濟貿易能力的共和國體制的獨立國家。一直到一七九七年才投降於拿破崙而亡國。關於威尼斯的國家發展史，請參考Lane(1973)。

這些偏離的案例存在的原因，在於社會事件的因果複雜性、決策者認知錯誤、甚至是決策者的不理性。對於邏輯上說得通的平衡理論，以無法辨明虛實真偽的歷史回溯研究來否證其權力平衡理論，否證效果不大 (Waltz, 1997: 913)。但是，如果依照Waltz的說法而將此等案例盡歸類為是決策者的不理性、錯誤認知甚至是愚昧驚鈍，則這類偏離案例的數量未免太多。偏離案例多到此等程度，使人不得不懷疑，外在效度欠缺至此，權力平衡理論如何仍能具備一般化普遍理論的資格 (Vasquez, 1997: 907-908)。

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即存有若干概念定義上的模糊，其中最重要的，本文認為是國家策略反應作為----「平衡」或「依附」----的定義。依Waltz的定義，平衡(Balance)是與弱者結盟來對抗強者—力量較強—的策略作為；依附(Bandwagon)指的是與強者結盟的策略作為。⁷ Waltz的理論基礎命題—強大等於威脅，看起來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果所謂的挑戰體系既有秩序的國家⁸，是徒具有修正體系既有秩序意圖但不具有足夠的客觀實力，而現狀偏好國家⁹在實力上卻超過前述修正主義國家的情形下，選擇與較弱的修正主義國家結盟來共同挑戰強大的現狀偏好國家集團，是依附還是平衡？與強大的現狀偏好國家集團結盟來共同抑制弱小的修正主義者，是平衡還是依附？依照Waltz的定義，前者是平衡，但是卻是與修正主義國家結合而共同對代表著體系既有秩序的強大集團進行對抗，是挑戰甚至是破壞秩序的；後者是依附，卻不是與對體系秩序造成威脅的危險國家結合，而使與現狀偏好國家結盟，來穩定既有秩序。

權力平衡理論的另一個概念上的模糊，是沒有區分客觀力量差距與主觀威脅意圖，以及此二變項因素對於國家行為者策略動機形成的意義與作用(Walt, 1987: 21-26; Rosecrance, and Lo, 1996)。申言之，Waltz並沒有區分下列三種可能造成體系變動的危險來源：「具備造成體系不穩定甚至是失衡的客觀力量且同時具有修正體系既有秩序的主觀意圖的國家」、「不具有客觀實力但具有修正意圖的國家」、「具有客觀實力但不具有修正意圖的國家」等三種體系危險來

⁷ 批評者自然也是依循同樣的定義(Schroeder, 1994b)。

⁸ 本文將抱持著修正體系既有秩序的意圖的國家，稱之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⁹ 相對於對體系既有秩序抱持著修正意圖的修正主義國家，偏好現有體系現狀的國家，本文稱之為「現狀偏好國家」。

源。Waltz之所以未對客觀實力與主觀意圖加以區分，歸因於權力平衡理論關注，集中在於客觀力量差距。所謂的「威脅」(Threats)，在Waltz的理論中，幾乎可以說是權力差距造成體系不穩定的過程中的一個必然效果而已 (Waltz, 1979: 192)。

但是，「威脅」概念在一般普遍的理解當中，顯然偏重於被威脅者的主觀感受，與涉及客觀衡量的力量差距，概念上確實是屬於不同層面。如Walt即從中東衝突案例研究中指出，客觀力量的差距一如軍力差距以及攻擊武器的數量——不能與主觀威脅等同視之，而決定策略選擇的因素是對威脅的認知而非單純的力量失衡 (Walt, 1987)。同樣的，如果以一七九二年開始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為例，各國「平衡」的對象——法國，相較於普奧組成的反法同盟，在客觀力量上確實是相對弱勢的，而各國結盟的對象——普奧——卻是軍力強大許多。依照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期，各國在一七九二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應該是與軍力上弱勢而受到普奧威脅的法國結盟，共同對抗強大的普奧同盟才對。但事實上各國的反應卻正好相反。Rosecrance與羅致政即據此指出平衡策略的對象應該不只是力量強大國家，而是具有威脅意圖的國家(Rosecrance, and Lo, 1996: 497)。申言之，Waltz是否將具有客觀實力的國家視為是體系不穩定或是失衡的唯一危險來源？沒有客觀實力但有積極修正意圖的國家，是不是就不構成危險？Waltz的理論似乎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意識到Waltz的理論具有理論與現實無法契合的重大問題，研究者紛紛嘗試對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提出修正，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威脅平衡理論最大的修正，在於對「危險來源」與「變動過程中的角色扮演」的二個概念，再加以區分，強調危險乃來自於另一個行為者對於被威脅者主觀上所造成的威脅認知。不同於Waltz專注於客觀力量差距，Walt認為國家行為者策略反應的對象，並不僅僅是比具有較自己更強大力量的另一個行為者而已，尚包括主觀層次的「威脅」(Walt, 1987: 5)。隨著所感受到的「威脅的層次」(the level of threat)的高低不同，國家行為者會依威脅層次高低而選擇對抗的平衡策略抑或是順從的依附策略。簡言之，威脅層次高，國家行為者將採取與威脅者對抗的平衡策略；威脅層次低，國家行為者將

採取與威脅者結盟合作的依附策略(Walt, 1987: 5)。

Walt的威脅平衡理論，對權力平衡理論做出三個重要修正：「主觀威脅概念的導入」、「重新定義平衡與依附的概念內涵」、「策略反應的動機」。但卻也在這三個重要概念上，出現影響其理論實用性的模糊。

第一個修正是就外在危險的來源，除客觀的力量差距外，再導入主觀的威脅意圖。Walt提出此一修正，顯然是希望能解釋若干面對力量差距相當大的對手卻沒有採取對抗策略，或是與對手力量差距不大卻採取對抗策略的案例(Rosecrance, and Lo, 1996)。依Walt的見解，由力量總和、地緣緊鄰、攻擊力量與侵略意圖四個要素所組成的「威脅層次」的高低，決定國家策略反應的選取。因此，威脅的概念除了其要素內涵具有重要性外，層次的高低區分才是最重要的變動：構成策略選擇變動的解釋變項。但Walt在論述過程卻沒有將危險的層次加以區分，只是總括地將四個要素加以描述而已。四個要素如何構成所謂「危險的層次」？四個要素間是否各自獨立而相互沒有關連？Walt並沒有討論到(Walt, 1987: 22-26)。

威脅平衡理論提出的第二個修正，是將「平衡」與「依附」二個重要概念重新加以定義。Walt將「平衡」定義為是「與其他行為者合作來對抗優勢的威脅」；而「依附」則定義為「危險來源結盟」(Walt, 1987: 17)。Walt的平衡定義，確實能處理上述權力平衡理論無法解釋的案例，但Walt在說明「依附」的結盟策略時，卻前後矛盾。Walt先將「依附」解釋為是非自願的、被強迫的屈服(Walt, 1988: 20)。¹⁰ 但是在說明依附策略作為發生的情狀時，Walt卻又指出獲利可能性的存在，是依附策略被採用的重要前提條件(Walt, 1987: 20-21)。如果依附策略是出於非自願的、被強迫的屈服，被威脅者對於自己有沒有獲利可能性的思考，便不是決定要不要依附的關鍵條件，威脅者的意志應該才是關鍵。顯然，Walt沒有將被威脅者的策略動機究竟是趨利或避禍加以區分。

Walt提出第三個修正也是與策略動機與行為特質有關。威脅平衡理論中的

¹⁰ Schweller批評Walt對於依附的定義，並沒有表現出「跳上花車」(to climb board the bandwagon)的通常意含，即未表現出趨利層次的意含(Schweller, 1998: 68-69)。

策略動機是規避威脅(threat-averting)，行為特質則是追求最大安全(security-maximizing)。依照此等動機與特質，特定國家行為者應該只有在無法與威脅者抗衡，也無法抑制威脅者的威脅意圖、又沒有同盟即時有效支援的情況下，才會被迫採取依附策略。但是，歷史研究卻顯示與強者或威脅者結盟，並不全是出於被迫的屈服，也往往可能出於是依附者對於獲利的期待。¹¹ Walt也意識到此一情狀，因此在不同的論文中，也坦承自願地與優勢的一方結盟合作，才是真正的「依附」(Walt, 1998: 75)。換句話說，由於Walt也意識到「依附」具有獲利與自願的意含，所以也承認國家行為者面臨體系不穩定甚至是失衡的變動過程時，確實有可能是出於追求利益的動機而決定其策略的。

(二) 國際政治理論研究與歷史

權力平衡的「行為法則」，是Waltz理論中最最重要的基礎內涵，也當然是Waltz眼中可以描述、解釋甚至是預測社會歷史變動的「沉澱物」。Waltz認為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確實解釋了過去與現在的社會歷史變動模式：單極與多極是不穩定的，不管行為者的主觀意願或行為動機為何，自然會出現平衡(balancing)(Waltz, 1997)。Waltz很有自信地指出，看看過去的幾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西班牙卡洛斯一世、法國革命前的路易十四、法國革命後的拿破崙、一次戰前俾斯麥體系以及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的霸權時代中，其他各國的反應，就可以證明權力平衡理論是正確的(Waltz, 1997: 54; 1979: 125)。

如同Waltz認為歷史為其理論提供佐證一般，在嘗試對於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研究主題與政策議題提出描述、解釋與預測時，國際政治研究者也多透過對於過去的社會歷史事件—特別是戰爭與和平的轉變瞬間—的描述與理解，來推導能解釋現在甚至是預測未來的行為法則。換言之，現實主義者顯然認為在面對相似的情狀時，除非有其他因素干擾，否則國家行為者必然會採取相同的反應(Nye, 1993: 137; Reiter, 1996: 132)。這也是包括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關係研

¹¹ Schweller稱之為「豺狗式的依附」(Jackal Bandwagoning)(Schweller, 1998: 77-78; Reiter, 1996: 3)。

究，在不同程度上都試圖從歷史中找尋問題與解答的主要原因。¹²

歷史之所以能如此被期待，反映出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研究，所抱持的二個共同的理論信念(theoretical beliefs)：即「現象變動的因果律」以及「行為者的理性」。如果要對社會歷史變動能有系統性的理解，並據以提出一個普遍化的理論，必定是以社會現象的變動存在有既定的因果，而且此一因果關係必然是具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做為重要的基礎前提：相同的或類似的「因」，在相同或類似的結構條件之下，必會造成相同或類似的「果」；而相同或類似的「果」，必然源出於相同或類似的「因」。此一「因果律」的確信，正是由個別歷史社會事件變化中隱含的法則所組成之科學與社會科學理論，在理論建構上的必要基礎。

除了因果律的確信外，更重要的是行為者的理性。所謂的行為者理性，是指行為者損益評估的能力，以及依照損益評估、偏好(preference)與對其他行為者行為之期待而決定自己的行動的策略理性。此一理性是穩定而規律的，即國家行為者在面臨相同或類似情狀，應該且必須是具備相同或類似的理性(Snidal, 1986: 39)。而正是此一行為理性，才使得行為者策略反應的普遍化理論的建立成為可能。

對「社會變動因果律」與「行為者理性」的確信，使得歷史的、回溯的、個案的觀察研究，對於通則化普遍理論的建構而言，具有其理論價值。並使研究者能從中找出具有普遍性與代表性的客觀結構情狀，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個別策略選擇與具體行為。申言之，因為社會變動的因果律以及個別理性的普遍性的理論確信，社會科學研究者才有可能透過觀察個別行為者的外在客觀行為，來推斷行為者在行為當時的內在主觀意念，進而建立社會科學的理論化通則(Snidal, 1986: 27)。但是，如果一個自信能說明行為理性通則的社會科學理論，卻沒有辦法在歷史中找到有符合其理論推演的事例佐證，甚至是歷史中已經有與其結論相悖的事例，則縱使理論的內在邏輯固然完整嚴謹，該理論是否正確或甚至是有用，至少是值得懷疑的。

¹² Schroeder雖然認為許多國際關係研究者錯誤的認識與解讀國際歷史，但仍承認國際關係研究者對於歷史的研究相當盡力而費心 (Schroeder, 1994b: 64)。

以權力平衡理論為基礎的結構現實主義諸平衡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臨了源出於歷史卻沒有辦法完全解釋社會歷史事件的窘境。更有趣的是，諸理論都以特定社會歷史事件做為案例樣本來佐證甚至是發展其具體的內容，但卻往往被其他研究以相同的案例樣本，透過不同層次、面向來加以質疑甚至是推翻。更甚者，只要把觀察的時間標準做更細緻或更化約的調整，同一時期的社會歷史事件的發展，往往會呈現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面貌。

以權力平衡理論為例，Waltz舉出法俄於一八九四年組成軍事同盟¹³來「平衡」德奧於一八七九年成立的德奧軍事同盟做為例示，並以之做為支持其權力平衡理論的主要案例之一。但是，Waltz卻也發現在德奧組成軍事同盟後，事實上又過了十餘年，法俄才組成軍事同盟之間，並且也明白指出有必要去檢驗這十五年間的國際外交與政治變動。很意外的，Waltz指出一檢驗工作應交由歷史研究者去進行的同時，而仍認為此一案例可以做為其理論的佐證。Waltz如此的自信，似乎代表著他認為此十五年間並沒有太大的政治外交變動，只代表著法國與俄國的「猶豫」期間而已 (Waltz, 1979: 125)。但是，德奧在一八七九年組成防衛同盟後，俄國事實上在第二年——一八八一年，便與德奧共組「三帝同盟」。雖然三帝同盟嗣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俄國仍與德國簽訂相互保證條約來維持原本的「三帝同盟」架構機制。¹⁴ 換言之，如果俄國在德奧成立軍事同盟後的十五年間並沒有任何動作，然後再與法國組成軍事同盟來因應德奧的同盟，則Waltz的說法看起來確實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德奧組成軍事同盟後，俄國卻立即在德國的邀請下，與德奧共組三帝同盟，而更在三帝同盟廢止後，仍與德國簽訂相互保證條約，延續三帝同盟的運作。¹⁵ 一直到一八九〇年德皇威廉二世拒絕續簽德俄相互保證條約後，俄國才在一八九一年與法國簽訂法俄協

¹³ 同前引註。Waltz似乎將一八九二年法俄同盟成立的時間誤植為一八九四年，但在理論討論上不至有太大的妨礙。

¹⁴ 關於當時德俄的同盟動機，參見Liddell-Hart (1972: ch.1); 關於第一次戰前的同盟變動，參見Pteres (1997)。另外，德俄於一八八七年簽訂的條約內容，是德俄彼此承諾除非俄國攻擊奧國或德國攻擊法國，否則雙方承諾在對方與第三國發生戰爭時，德俄彼此應保持友善中立。換言之，德俄是相互保證有條件的友善，此從上述Liddle-Hart著作中觀之甚明。國內譯本將Double-Assurance譯為「雙重保障」，似未能表其真意，應以「相互保證」為宜。

¹⁵ 三帝同盟與德俄相互保證條約的主要內容，是雙方約定：除非俄國攻擊奧國或德國攻擊法國，否則雙方承諾在對方與第三國發生戰爭時，德俄彼此應保持友善中立(Liddell-Hart, 1972: Ch.1)。

約，並於第二年組成以德奧義於一八八五年成立的三國同盟為對手的法俄軍事同盟。所以，俄國在德奧組成軍事同盟後，是先採取與德奧結盟合作的策略，並不是立即與法國結盟來對抗。而是直到德國不願繼續德俄相互保證條約後，才與法國結盟來對抗德奧義三國同盟。因此，與Waltz的期待相反，俄國於一八七九年在一八九一年間與德奧的關係，不但不能做為其理論的佐證，反而可能有否證其理論的效果。¹⁶ 簡言之，Waltz只關注德奧軍事同盟與法俄協約二個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關聯意義，忽略了一八七九年德奧軍事同盟與一八九一年法俄協約之間同盟關係的變動，仍以之做為其理論的佐證，顯然是失策於過於化約社會歷史事實的變動。

Waltz除了一方面認為過去眾多的歷史變動，足以證成其看似言簡意賅的權力平衡理論概念，在承認更仔細的外交與政治變動應該交由歷史研究者去進行之餘，還是宣稱歷史是站在權力平衡理論這一邊的 (Waltz, 1979: 125)；另一方面，Waltz在面對其他人的質疑時，卻採取「非歷史」(A-Historical)的態度，認為過度拘泥於實際的外交決策作為及過去歷史社會變動，不但對於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沒有任何幫助，甚至是有妨礙的。申言之，由Waltz所代表的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的美國國際政治學術主流認知，似乎認為這個「沉澱物」，如同其他物理邏輯一樣，可以輕易地在統計甚至是邏輯中找到軌跡，不需要去檢視過去人類社會歷史的細微變動就可以發現。歷史研究是歷史學家的事，外交研究則是外交學者的事，國際政治研究者沒有辦法也不需要去做非本行的事。此一「非歷史」的態度，也是其他國際歷史學者與國際政治學者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美國政治學會出版的著名政治學刊物—*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於一九九七年底第九十一期第四卷，由John Vasquez以“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為前導論文，集合了Waltz, Walt, Christensen, Snyder, Schweller, Elman等人，對於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提出質疑、辯護與討論。這幾篇文章，乃繼新自由主義論者Keohane主編的*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Keohane, 1986)之後，直接對權力平衡理論進行討論與

¹⁶ 其實德奧軍事同盟與稍後的德奧俄三帝同盟的目的，是在試圖共同對巴爾幹進行干預，而非單純的軍事攻守同盟。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同盟關係變動，留待稍後再仔細討論。

爭辯的重要著作集。Vasquez與Colin Elman更在二〇〇三年初，再收錄Vasquez、Schroeder、Levy、Rosecrance、Beuno de Mesquitz、Maoz、Barnett、Wohlforth、Glaser等人的後續相關回應與論述，以*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Vasquez, and Colin, 2003)為名，與先前的數篇論文集成書，可以說是目前思考並反省國際政治理論—特別是以國際歷史社會變動為重要研究主題的結構現實主義的最重要著作。Vasquez主要論點，在於指出現實主義做為一個理論典範而言，是退化的 (Vasquez, 1997)。¹⁷ 針對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Vasquez主要的攻擊重心，即在於眾多的歷史研究顯示，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與真實社會歷史變動是不相符合的。簡言之，歷史研究顯示，國家行為者往往不像Waltz的理論所描述或預期般，採取結弱制強的平衡策略 (Rosecrance, and Lo, 1996; Rosecrance, 2003; Schroeder, 1997, 2003; Schweller, 1994, 1998; Vasquez, 1997, 2003)。Waltz並沒有直接否認其他學者的歷史研究結果，反而很有技巧地在研究方法層面上進行反駁。

Waltz的回應分為二個部份。Waltz首先指出，歷史錯綜複雜，因果關係多重而相互干擾，即便是在歷史變動當時的人，也無法完全充分理解並確定社會歷史變動的因果關係，後世的人更不可能有完全充分的理解。因此，Waltz正確地指出後世對於過去歷史事件的本身以及其環境的研究與理解，都是片斷的，都是在邏輯上不可能是正確的。Waltz更進一步指出既然對於過去歷史事件的研究是不可能達到完整，任何源出於歷史研究的結論，在邏輯上就不可能是正確的，在邏輯上也無法否定其他的理論命題，除非找到確定證據來否定或推翻其他理論賴以建立的證據 (Waltz, 1997)。換言之，Waltz在此採取非歷史(a-historical)的觀點，來為其理論無法解釋眾多重要歷史案例進行辯護，反而沒有提到為何原本在他認知當中足以證成其理論的重要歷史事件—西班牙卡洛斯一世、法國革命前的路易十四、法國革命後的拿破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俾斯麥體系以及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的霸權體系，經過歷史學者與國際政治學者的仔細努力研究後，竟會呈現與其原本的直覺相悖的結果。

¹⁷ 此文內容可參考東吳大學博士班陳宏銘先生於本期學報提出之〈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進步或退化--以Vasquez採Lakatos科學研究綱領的討論為焦點〉一文。

簡言之，從方法論上來看，Waltz是以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因果複雜限制，來做為抗辯 (King, 1994: 9-10, 42-43, 93-94; Alker, 1996: 787)。可是Waltz並沒有停留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反而再進一步展現其非歷史的觀點態度。在面對Schroeder等人所進行的歷史研究的質疑，Waltz的辯解則是直指Schroeder誤解了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的內涵以及其在科學解釋上所企圖實現的目的。因此錯誤地期待結構現實主義是試圖解釋外交政策行為與國家決策者的動機與目的，而這種企圖並非權力平衡理論所欲而且也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做到的。因此，Waltz認為Schroeder等人所提出的歷史證據，是「無關緊要的外交知識的雜錄」(a *mélange* of irrelevant diplomatic lore)。不過Schroeder認為自己並未如指責般對於權力平衡理論的內涵與目的有所誤解，也不認同Waltz所謂「歷史證據是『無關緊要的外交知識的雜錄』的描述」(Schroeder, 2003: 115)。Schroeder認為這不是歷史學家對於細微枝節的堅持，反而是在呈現國際政學者以過於簡略膚淺的歷史觀察所建構出的社會歷史變動，可能根本就是一個錯覺 (Schroeder, 2003: 117)。而從這種錯覺所導引並建構出的理論，就如同是建築在沙地上的愚人之屋，是經不起考驗的。Schroeder進一步發現，Waltz雖然在理論建構過程中，提到許多政治哲學與科學，並舉通俗歷史為例，卻從沒有嚴肅而仔細地去檢視他所提出的普遍通則與歷史變動模式，是否與歷史研究所得者一致 (Schroeder, 2003: 116)。

Waltz提到的許多支持權力平衡理論的案例中，至少就拿破崙體系與俾斯麥體系而言，Waltz的認知顯然與當代歷史研究的結果，確實有相當的落差。不論大小國家，都傾向於接受拿破崙以及俾斯麥的霸權狀態，即便是英國也是如此。拿破崙時期各國紛紛抵抗法國的結果，是由於拿破崙如同黑道流氓般強取豪奪使然，並非單純對於巨大力量的恐懼 (Schroeder, 1990: 147; 2003: 116)。Rosecrance也指出，Waltz試圖以經濟學市場型態的邏輯來解釋國家的行為反應，但是以經濟學市場型態中，所謂真正能達到定義上以最低價格交易的「供需平衡」的完全競爭市場，也只是四種市場型態中的一種而已，並非常態，寡占與獨占也是另一種可能出現的型態。Rosecrance也指出在國際歷史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卡洛斯五世、維多利亞中期以前的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都

是具有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的超級大國。而這些國家已經處於主導整個國際體系的超高等級地位，其他的國家反而願意在其勢力下生存，而不會貿然去進行挑戰 (Rosecrance, 2003: 115-116)。換言之，Rosecrance似乎從歷史觀察中得到結論：Waltz的權力平衡理論中所謂的「自動平衡」(automatic balance) (Waltz, 1997: 913)，可能只是眾多不同型態中最少甚至尚未曾出現過的一種 (Waltz, 1997: 913)。Schroeder也表示，如果真的有一個共通的模式，就是一個霸權國家失策地或有意地壓迫其他小國，使得原本願意接受其霸權地位的小國，無法容忍其霸權控制或無法自其霸權統治下獲利，才不得不起而反抗。Rosecrance與Schroeder均指出如拿破崙與希特勒等歷史事件，傳統上被認是因為其霸權強勢地位而遭到其他國家採取「平衡」措施加以制衡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彼等透過歷史觀察研究發現，Waltz認為可以證實其平衡理論邏輯的這些所謂的破壞平衡穩定的強國，都是因為過度擴張與沒有節制的攻擊，才使得原本已經願意接受其霸權控制的其他國家，不問大小而被迫起身抗爭以求自保，並非單純的結弱制強邏輯可以解釋的 (Rosecrance, 2003)。Schroeder更明白的表示，如同霸權安定理論所觀察到的模式，由良善的霸權所主導的霸權體系，在五百年的西歐國際政治變動過程中，是最穩定的權力結構狀態 (Schroeder, 2003: 117)。

Schroeder更進一步指出，Waltz所引用的確實是人人皆曾聽聞的歷史，但問題是以Waltz為首的結構現實主義者，通常都忽略眾多歷史證據，只憑太過簡略的歷史直觀印象 (Schroeder, 2003: 118)。據此，Schroeder更直言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的問題，並不在於其理論命題是否受到歷史證據充分地否證，而是在於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使得學者疏於找尋國際政治的更深切的真實(reality) (Schroeder, 2003: 114)。

Vasquez也把原來從抽象的方法論層次上的非難，轉變為更具體的不滿與懷疑。與Schroeder一樣，Vasquez認為一個宣稱達到普遍化的政治理論，在面對眾多歷史上不符合的證據時，不但不能加以忽視，更不能透過設定更多的前提條件，來將與理論預期不符合的歷史案例加以區隔 (Vasquez, 2003)。

可是即便面對許多來自於國際政治學者與國際歷史學者的質疑，Waltz以及其他如Walt、Christensen以及Snyder等對權力平衡理論進行修正的學者，都認為「平衡」的理論核心內容，是正確的 (Christensen, 1990: 919-922; Walt, 1997:931-935; Waltz, 1997: 913)。換言之，即便無法解釋過去重要的歷史事件，甚至是與過去的歷史事實相左，Waltz等結構現實主義學者仍然堅信結弱制強是國際政治領域中的通則。

國際政治領域的平衡理論，源出於歷史而無法解釋歷史，這樣的矛盾，不能等閒視之。因為如果一個建立在歷史社會變動具有一超越時間空間的普遍共同模式的前提上，而以解釋歷史社會事件為目的的理論，竟然不能解釋過去所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如何能說服旁觀者來成為其理論的信徒？然而，現實主義諸理論無法充分解釋歷史社會事件演變，問題不可能出在歷史本身。因為歷史是已經發生之事物，問題只會出在對於歷史的認識、理解與詮釋。換言之，諸平衡理論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外在效度欠缺，可能均代表著結構現實主義所找尋的國家行為者的共同理性與行為模式，或許不是結弱制強般單純，而是有另一種與權力平衡理論或威脅平衡理論所敘述者般的不同的，更純粹的行為理性本質。而此一純粹的行為理性本質，以及其所導引出的通則化行為模式，應該而且唯有透過對社會歷史事件變動的觀察與歸納，才能看出端倪 (林碧炤, 1997:)。

三、策略環境、角色扮演與策略動機

既然歷史重要而不可忽視，本文便嘗試透過對於社會歷史事件變動粗略的觀察與歸納，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初探，以便能更具效度地解釋國家行為者面臨外在危險的策略反應。本文認為，依據國家行為者所面臨的個別策略環境，以及該國家與其他國家在該環境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將會使國家行為者以不同策略動機，依照認知到的危險或風險程度，採取不同的策略反應。

(一) 策略環境與角色扮演

從權力平衡理論、威脅平衡理論到利益平衡理論，國家行為者客觀國力的

大小一向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客觀國力的大小，關乎國家行為者在對外與對內行為上可應用的資源多寡，以及對手能應用來與自己對抗的資源多寡，自然是會影響到策略的選取。但在實證案例分析的應用上，國力大小卻往往是一相對不確定的概念，必須在參與變動過程的行為者間進行比較，才具有意義。

除了客觀國力大小外，另一個更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因素是個別國家行為者在體系變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個別變動過程中，不同國家會扮演下列不同的角色：危險國家、被威脅國家、現狀偏好國家、旁觀國家。

所謂「危險國家」者，指的是因為具有主觀修正意圖或客觀力量過大，而造成局部的體系不穩定甚至是全面性的體系變動的危險來源國家。危險國家尚可細分為三類：有修正意圖也有修正實力的國家，如一四三〇年後侵略巴爾幹半島的土耳其、一七九三年後在歐洲進行思想與軍事政治擴張的法國、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在歐洲進行武裝侵略的納粹德國；第二類是有修正意圖但沒有修正實力的國家，如第一次戰後之於南歐與北非的法西斯義大利與現在之於東北亞的北韓；第三類是沒有修正意圖但有修正實力的國家，如西元前一五〇年備戰而意外導致羅馬來攻而亡國的迦太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危險源的不同，對於體系的影響以及其他國家對此等危險國家的認知，自然也會有不同。

所謂「被威脅國家」，指的是於危險國家引發的變動過程所威脅的國家。被威脅國家也可細分為二類：直接遭危險國家所威脅或攻擊的「直接被威脅國家」，例如於一六四五年對土耳其的克里特島攻防戰的威尼斯、一七九七年被拿破崙的北義大利軍團攻擊的威尼斯、一九一四年被德國下達最後通牒要求無條件過境而嗣後被侵入的比利時以及被視為優先打擊對象的法國、一九三九年被納粹德國侵略的波蘭等等。除上述直接被威脅的國家之外，尚有雖未直接被危險國家攻擊或威脅，但因為地緣上具密接性或與直接被威脅國家具有利害關連性，因而間接地受到威脅的「間接被威脅國家」，如一七九二年因為法國國民公會宣布將開放須爾德河(Scheldt)貿易並派遣海軍戰隊溯河進攻比利時中部的安特衛普(Antwerp)時，決定直接加入歐陸衝突的英國，即屬於此類。

所謂「現狀偏好國家」，指的是認為現狀對其有利，但因為體系不穩定而感受到如不採取應對措施者，現狀即將被修正，故對危險國家採取不支持甚至是對抗制衡的態度的國家。通常體系內一級強權大都是偏好現狀，特別是就保持其體系內一級地位的既有權力排序的維持而言。一八一五年第二次巴黎條約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國都在歐洲扮演著此一角色，而如何以平衡者 (*Balancer*)來維持對英國霸權有利的穩定體系，也就成為英國主要的對外政治、軍事與經濟政策的主軸。除了一級強權外，大部分的小型國家都屬於偏好現狀的。因為國力太小，在體系變動的過程當中不但不能趁機獲取利益，往往可能直接被害或意外受波及。威尼斯於一七九二年第一反法同盟戰爭期間，始終嚴守中立，即屬於此一典型，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的荷蘭與比利時，也是此屬此類。

所謂「旁觀國家」，即指對於現狀變動與否，在外觀上保持冷漠，也沒有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威脅，完全處於變動的影響範圍之外的國家。此等國家通常是在地緣上與衝突的地區有相當的距離，並且與參與變動過程的國家沒有利害關連性。美國在第一次戰後到第二次戰前，即因為政治、經濟、地緣等因素而採取此種態度，對於歐洲的紛亂保持冷漠的態度。但旁觀國家亦可分為二類：一類是保持距離，自始對於變動過程漠不關心的國家，如前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一類是雖然保持觀望態度，但隨時準備加入，以便能獲取利益剩餘，如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羅馬尼亞 (Liddell-Hart, 1967: ch.13)。

以上各不同的角色扮演，將影響到國家行為者在體系變動過程當中，對自我所面對的環境、現有的地位、他行為者對自我的態度以及即將採取的行動、自我可能即將面對的未來、以及不同策略所帶來的不同後果等各種不同情狀的認識，亦即對於自我所處的策略環境的主觀認知。

(二) 策略動機

對於客觀策略環境的認知，特別是自我與他行為者彼此間的角色扮演的不同，將會使個別行為者對於體系變動過程有不同的認知，進而抱持不同的行為動機。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動機有二：趨利或避禍。抱持趨利動機，將使得國家

行為者在外觀行為上，具有利益最大化特質；抱持避禍動機，將使得國家行為者在外觀行為上具有損害最小化特質。

危險國家—特別是有修正意圖者—往往把變動過程視為是增加自我利益進而提昇自我於國際權力結構中地位的有利途徑，其動機是趨利的；再行為上則是透過積極的作為，挑戰既有的秩序，企圖進行局部的、暫時的甚至是全面性的、永久性的體系現有狀態的調整。

直接被威脅的國家通常承受危險國家的直接威脅或攻擊，其動機很難說是趨利，僅能是避禍的，特別是危險剛發生而體系變動過程剛開始的時間點上。至於間接被威脅的國家所抱持的動機，基本上是趨利的。因為未受到直接的攻擊與威脅，必然會評估體系變動的可能結果是否可使自我獲利。

現狀偏好國家對應於體系不穩的動機，基本上是避禍的，因為其偏好現狀，代表體系既有的現狀對其是有利的。危險國家挑戰既有體系秩序，如果是局部的，有特定對象的，除了對直接被威脅國家造成威脅或危害外，則對於現狀的維持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多次挑戰體系秩序從而持續累積力量的結果，危險國家可能會使得體系權力分佈的既有狀態無法長久維持。如果危險國家的修正過程是全面的、永久性的，則對於現狀偏好國家的威脅與挑戰，自是無庸置疑。

觀望國家(Bystandering)的動機可能是避禍的，也可能是趨利的。因為觀望國家基本上是與衝突區域與發生衝突的行為者沒有直接的關連，保持距離是避免意外被捲入衝突的最佳策略。但是如果能夠適時並正確地加入優勢的一方，觀望國家也是可能因而藉由他人之助，獲得原先不可能單靠己力獲得的實質與形式利益。

(三) 風險/危險認知與策略反應

針對不同的策略環境、不同的角色扮演以及行為動機，本文針對國家行為策略的反應模式，提出一個待進一步驗證的假設命題：個別國家行為者對於體系變動的風險(Risk)/危險(Danger)程度的認知，決定個別國家面臨外在危險的策

略反應。

「危險/風險認知」，乃行為者對於自我與潛在或實在對手的互動關係狀態以及對於體系變動狀態的意義的主觀認知。所謂的「危險」，指的是對於自我國家安全是否有受到侵害、以及受到侵害的可能範圍與規模的認知。所謂的「風險」指的是投入修正過程所必須的資源成本、所獲得的利益、以及獲利實現的範圍與可能性的比較。

「危險」或「風險」的區分意義，主要在於對非危險國家的其他國家而言，是否受到危險國家直接的威脅或攻擊，將影響到其後續的行為動機。受到直接的威脅或攻擊者，行為者會以避禍的動機來決定其策略；受到間接的威脅者，行為者會以趨利的動機來決定其策略。

如果行為者的動機是趨利，行為特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追求最大的利得。這個可能的範圍，指的是行為者在決定是否參與變動過程或以何種角色加入變動過程前，透過主觀的評估，計算參與變動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扣除必須付出的成本——可能是積極的主動付出或消極的被剝奪——之後，是否仍有剩餘，而且獲利實現的可能性的的大小。簡言之，風險程度不能太高到不划算。而評估划算不划算的基準，必須將現狀維持的利益也加以考慮。如果與抱持修正意圖或即將要對體系既有秩序造成調整的危險國家合作甚或是結盟，破壞體系現狀後不但沒有獲利，反而損失更多者，理性的國家行為者必然會加入現狀偏好國家陣營，共同來抑制危險國家的修正舉動或意圖。但如果與危險國家合作的獲利可能性愈高，則加入危險國家的動機愈強。簡言之，在趨利的動機與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特質下，國家行為者看的是風險，是成本效益比較以及獲利實現的可能性與範圍。

但是，如果是出於避禍的動機，行為特質則是在可能的範圍內追求最小的損害。這裡所謂的可能範圍，指的是各種不同策略所帶來的損害的比較。行為者一樣必須在變動過程開始前，最慢則必須在變動過程結束前，透過主觀的評估，評估不同的策略反應選擇在變動過程後所造成的各種損害的程度與實現可能性，然後選擇造成損害最小的策略。簡言之，在避禍的動機與損害最小化的

行為特質之下，國家行為者看的是危險，是在面臨直接攻擊與威脅時，比較雙方力量與權力地位、威脅兌現的可能性以及自我脆弱度的自我評估。國家行為者必須儘可能避免損害的發生，即便損害無法避免，也要試圖將其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而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也將隨其所認知到的風險程度或危險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在評估此一互動關係的認知時，有三個主要的變項因素會被考慮：「力量差距」、「威脅意圖」與「依賴關係」。

所謂的「力量差距」者，指的是危險國家與其他自認為與該危險國家所引起的體系變動有關的國家間，彼此再客觀力量的差距。衡量客觀力量大小的依據，包括天然資源、經濟生產量能、現有技術水準與技術力、人口數量與品質、國家財富總數及國內抽取力、兵力總數與品質、武器數量與質量等客觀可以評估的資源。特別是雙方的軍力差異，往往是在衝突爆發前衡量彼我力量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在評估涉入體系變動過程中行為者的力量差距時，特別是危險國家與直接被威脅或間接被威脅的國家間的差距，應重視雙方軍力的比較評估。如果被攻擊或被威脅者的軍力遠遜於危險國家的軍力而無法與之抗衡時，雙方的力量差距即屬於差距程度高；如果被威脅者的軍力雖遜於被威脅者的軍力，但仍保有部份軍事優勢者，雙方的力量差距即屬於程度中等；如果危險國家的軍力僅稍優於或等於甚至是遜於被威脅者的軍力，則雙方的力量差距即屬於差距程度低。

所謂「威脅意圖」者，指的是危險國家以積極作為侵奪或危害體系內其他行為者既有安全與利益的主觀意圖。威脅意圖並非固定一致的，而有直接明顯與否、立即與否、持續與否的差別。如果威脅屬於直接、明顯、立即，而且危害的企圖是持續而無限制的，則此一威脅意圖當即屬於程度高；如果威脅的企圖存在，但是威脅的意圖是有限的，且可以在危害實現前或危害擴大前，或由被威脅者以積極作為加以嚇阻，或提供適當可忍受貢獻而解消危險國家的敵意，此一威脅意圖即屬於程度中等；如果威脅不直接、不明顯、不立即者，威脅意圖即屬於程度低。

所謂的「依賴程度」者，指的是被危險國家威脅或因為體系變動而受到威脅的國家依賴危險國家的差別依賴關係。此一差別依賴關係將產生經濟上的控制狀態，而此一經濟上的控制狀態將逐漸擴散到政治與安全層面，從而減低被威脅者對於危險國家的抵抗量能。因此，差別依賴程度愈高，被威脅者的脆弱度愈高。如果危險國家控制某一項或幾項被威脅國家經濟運作所必須而又無法自行取得的資源要素者，則被威脅者依賴危險國家的依賴程度即屬於程度高；如果雙方雖有此一依賴關係存在，但被威脅者可以找到替代來源，或者危險國家在某一項或幾項必要而又無法自行取得的經濟資源要素上，亦由被威脅者所控制與提供時，至使雙方處於互賴狀態者，則依賴程度即屬於中等；如果雙方沒有依賴關係者，依賴程度即屬於程度低。

上述「力量差距」、「威脅意圖」、「依賴程度」所構成的風險/危險認知，即可能出現各種不同的可能。一個極端是全面的危險，即就危險國家與被威脅者而言，危險國家力量遠遠超過被威脅者，且危險國家的威脅意圖直接明顯且立即，而更不幸的，被威脅者又依賴危險國家。另一個極端是全面的安全，即雙方力量差距微小、危險國家沒有威脅意圖、雙方沒有差別依賴關係或處於高度的互賴關係。但除了三種因素兼具或三種因素全無的情況，尚有其他可能，例如：力量差距存在且威脅意圖亦具備，但並無依賴關係；力量差距存在而有差別依賴關係，但無威脅意圖；有威脅意圖且有差別依賴關係，但無力量差距。

將力量差距、威脅意圖與依賴關係加以組合討論，主要在於企圖指出上述三個構成國家行為者對於外在危險的主觀認識的變項因素，並不僅僅是單純獨立運作或全部併存而已，即便單一變項因素不存在，不表示對於特定國家行為者而言，即不存在外在危險。因此在評估彼我雙方的關係，或者是從研究者的角度去觀察特定變動過程當中被威脅者所感受到的危險程度的主觀認識時，必須同時透過上述三變項要素加以通盤評估考量。

四、依附與平衡之間

Waltz指出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雖然是以「平衡」為主要選擇，但是在特

定的情狀下，會採取「依附」的策略，而這個情狀是在衝突已然爆發，而且勝負局勢以臻明朗，此時加入仍然有獲利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安全不會危害 (Waltz, 1979: 126)。換句話說，以Waltz的理論解釋，在衝突爆發前，面對即將發生的體系變動，國家行為者必然會平衡策略—結弱制強。

Walt的威脅平衡更複雜。Walt提出構成「威脅」的力量總和、地緣鄰接性、攻擊力量與威脅意圖四項變項因素，並以威脅的層次變動影響到國家的決策選取，但Walt並沒有解釋如何區分威脅的層次。Walt卻在斷言「平衡」策略被選擇的機會多於「依附」策略被選擇的機會時，指出幾個關鍵的因素會影響到行為者與威脅者合作或與其他現狀偏好國家合作的策略選擇。這幾個因素是力量差距、他國的支援、威脅者的敵意、勝負的局勢、獲利的可能性。Walt認為如果被威脅者與威脅者的力量差距低、他國的支援可得、威脅者的敵意很高、勝負的局勢未明、獲利可能性低者，被威脅者將與其他國家合作來共同抑制威脅者的修正意圖；但如果與威脅者的力量差距很大、無法得到他國即時而足夠的支援、威脅者的敵意不高、勝負局勢已分(威脅者即將獲勝)、獲利可能性很高時，與依附到威脅者而與威脅者合作，是合理的策略 (Walt, 1987: 17-31)。同樣的，Walt也認為在衝突爆發前，面對即將發生的體系變動，國家行為者會採取平衡策略—聯善抵惡。

如前述，Schroeder的歷史研究，構成對權力平衡理論外在效度欠缺的最主要而最強烈的質疑。Schroeder指出國家行為者在依附與平衡策略之間，還有可能採取置身事外的「躲避」(hide)策略或是試圖透過主動調整國際權力地位區劃方式來滿足威脅者以解除其敵意的「超越」(transcend)策略。不過Schroeder核心的質疑，是認為以簡單的策略選項後果來區分不同時間與不同空間的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乃忽略了歷史事件的因果複雜性與國家行為者發展的個別複雜性 (Schroeder, 1994b)。由此看來，Schroeder似乎是根本否定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是有模式可循的，等於是否定現實主義的行為理性的基本理論前提。

Schweller的區分更形複雜。Schweller指出不同的利益偏好，¹⁸將使各國家

¹⁸ Schweller認為國家行為者的偏好可分為：無限制修正體系現狀、有限度修正體系現狀、對於體系現狀漠不關心、鬆散而有彈性的偏好體系現狀(指願意容忍些微的調整)、嚴格堅持現狀維

行為者對於體系不穩定有不同的認知：將體系不穩定認知為威脅者，將以規避損害為動機，而採取以下六種策略：平衡(Balancing)、依附(Bandwagoning)¹⁹、約束(Binding)²⁰、保持距離(Distancing)、推諉(Buckpassing)²¹、交往(Engagement)²²；將體系不穩定或失衡的狀態認知為獲利機會者，將採取以下五種策略：豺狗式依附(Jackal bandwagoning)²³、攀附(Piling on)²⁴、追隨(Bandwagoning to Wave of the Future)²⁵、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²⁶、維持平衡(Holding the Balance)²⁷。並認為影響到其他國家將體系變動認知為危險抑或獲利機會的重要因素，是客觀力量(以國家大小來衡量)與國家利益(Schweller, 1998: 15)。換言之，Schweller認為影響到國家行為者對於體系變動究竟是危險或是獲利機會的因素—即國家行為者的「利益取向」，顯然是利益平衡理論中，決定國家行為者行為動機與特質的最重要解釋變項。而且依照利益平衡理論，國家行為者在面對威脅的時候，不論直接受威脅或間接受威脅，策略動機中都有趨利的意味。以Schweller並沒有進一步解釋此一利益取向的來源以及其形成差異的原因。簡言之，Schweller的利益平衡理論，利益取向似乎取代體系環境變動而成為最重要的解釋變項。

況且，事實上除了修正主義國家之外，中小型國家往往無法在變動的過程當中，均堅持在原有的利益取向之上。試想，在面對來自體系一級強權而抱持無限制修正意圖的野狼國家的直接威脅甚至是時，除了被迫屈服或孤注一擲地

持等六種。但此六種偏好差異的形成，Schweller並沒有明確地加以說明(1998: 84-91)。

¹⁹ 此處的依附指的是受到直接的威脅而被迫屈服(Schweller, 1998:67-70)，因此應該以「屈從」Capitulating一詞較適切。

²⁰ 指的是與威脅者締結盟約而加以約束(Schweller, 1998: 70-71)。

²¹ 指的是與現狀偏好國家結盟但企圖規避責任而享受他人努力的好處(Schweller, 1998: 73-74)。

²² 將修正主義者融入既有體系，必要時透過調整既有體系來反應實際上的力量分佈(Schweller, 1998: 74-75)。

²³ Schweller指的是主動的與威脅者或強者結盟，企圖透過共同挑戰體系秩序而獲利(1998: 77-78)。

²⁴ Schweller指的是在戰爭或衝突局勢明朗，勝負明顯的時候，加入即將獲勝的集團(1998: 78-79)。

²⁵ Schweller指的是強者代表外來主導的趨勢，因而會吸引其他國家的追隨，如二十世紀中期第三世界國家追隨共產主義集團(1998: 79-81)。

²⁶ Schweller指的是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個別事件，將造成鄰近或其他處於類似情境的國家或地區產生類似的事件，進一步擴散到更多國家或更廣的地區(1998: 81-82)。

²⁷ Schweller指的是擁有實力而能影響到體系平衡或失衡的國家，能夠利用其他國家或陣營衝突而體系變動的機遇，以自己的優勢實力來穩定體系的既有秩序(1998: 82-83)。

抵抗外，如何能依循原有的利益偏好而採取保持距離、卸責推諉、交往與約束等等策略？對這些中小型國家而言，既然不抱持修正既有體系的意圖，自然是對體系不抱持修正的態度。此等直接被修正主義國家直接威脅的中小型國家，要不一定會採取加入現狀偏好國家集團，即採取所謂的「平衡」、「推諉卸責」，否則就是「保持距離」，最糟的情況就是被迫「屈從」，實在沒有機會如利益平衡理論預期般採取自願而趨利的依附策略。²⁸ 利益平衡理論強調趨利動機至此，顯然與其對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過度強調避禍動機的批評一樣，是以偏概全，只是方向與威脅平衡理論恰恰相反，把避禍的動機壓縮到從屬於對利益的追求的動機當中。

本文認為，要觀察國家行為者面臨外在危險的策略反應，必須將觀察點聚焦於體系不穩定或失衡的開始點與開始之前的時刻。行為動機與行為特質的取向，被非全然是體在體系變動前即已然形成而固定。即便是在體系變動前，對於自我與他行為者於體系中的既有權力地位以及角色，便有基於過去互動經驗所學習而得的認知甚至是信念 (Reiter, 1996: 1-12)，在面對新的體系不穩定甚至是失衡的結構變動時，策略環境的現實與對於此等現實的認知，對於決策動機影響力將增強，成為決定策略的主要因素。但是觀察的時間點不能過晚，否則勝負局勢將成為焦點，因為決策環境與決策心理已然因為戰局明朗而改變，已不同於原先體系不穩定或失衡開始點之前的決策環境與決策心理。

觀察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歷史社會變動案例樣本，本文歸納出國家行為者的策略反應主要共有下列六種：依附(Bandwagoning)、觀望(Spectating)、平衡(Balancing)、躲避(Hiding)、屈從(Capitulating)、對抗(Confronting)。

(一) 依附

所謂「依附」，本文定義為是造成體系變動的危險國家進行自願的、趨利的合作、結盟或共同行動。概念定義與Schweller所謂的「豺狗式依附」(Jackal

²⁸ Schweller所謂的「依附」Bandwagoning，具有依附或屈從的二種意含。「依附」者，即如豺狗國家一般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願地加入野狼國家，Schweller稱之為「Jackal bandwagoning」。而屈從者，指的是非自願地屈服於野狼國家或豺狗國家，以企圖能在有限度的犧牲下保有若干剩餘，Schweller稱之為「Strategic surrender」(Schweller, 1998: 67-68, 77-78)。

Bandwagoning)相同(Schweller, 1998: 77-78)。

蘇聯與納粹德國共同瓜分波蘭，便是此一策略的絕佳例證。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下達準備於同年九月一日侵入波蘭的訓令後，迅即於四月十七日與克林姆林宮進行協商，以瓜分波蘭來勸誘蘇聯合作。英國同時也積極與蘇聯接觸，希望獲得蘇聯的支援，以便能藉由二面作戰的威脅來抑制希特勒侵入波蘭的野心 (Fuller, 1956: 374-375)。史達林被瓜分波蘭的利益所誘惑，加上英國的干預動作不甚積極，遂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希特勒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並約定共同瓜分波蘭 (Liddell-Hart, 1967: 222-225)。在二次世界大戰前與戰爭期間，除了蘇聯之外，日本、匈牙利、保加利亞均被納粹德國所誘惑而先後依附到德國這一邊，法西斯義大利更是仰賴德國的奧援，才能在北非抵禦英國的攻勢 (Schweller, 1998: 78)。一八八一年俄國與德奧共組「三帝同盟」，亦屬此類。德奧一八七九年的軍事同盟，確實使得整個歐洲體系進入失衡的邊緣。德奧成立軍事防衛同盟後，兩國軍事人員總數，已逼近當時歐洲軍事人員數最多的俄國(707,000人：843,000人)，軍事支出總額則超過俄國而成為歐洲之冠(33,701,000英鎊：32,091,000英鎊)，德國重工業產能原本就已超越俄國而為全歐洲第二位，僅次於英國，加上奧國的產能，俄國更無法比擬(2,370,000噸：430,000噸)。

	British	Germany	France	Russia	Austria	Italy
MILPER	260	430	525	843	277	167
MILEX	25121	19656	29391	32091	14045	8073
ENERGY	119446	42524	25372	4099	10713	1558
IRST	6090	1970	1400	430	400	10
UPOP	8992	3016	3678	2944	1520	2329
TPOP	34304	44640	37320	98368	38620	27951

圖一：1879年歐洲主要國家國力比較表²⁹

俄國並沒有立即與法國結盟對抗，而三帝同盟不但持續到一八八七年，甚至透過德俄相互保證條約而延續到一八九〇年。俄國之所以願意加入德奧而共

²⁹ MILPER=軍事人員數(單位:千人)、MIEX=軍事支出(單位:仟英鎊)、ENERGY=能源消耗數(單位=煤千噸等值)、IRST=鋼鐵產值(單位=千噸)、UPOP=都市人口數(單位:千人，代表可有效動員的人力資源)、TPOP=總人口數(單位:千人)(Singer, 2002)。

組三帝同盟，主要是期待能與德奧合作來提昇對巴爾幹半島事務的影響力。而俾斯麥則透過三帝同盟與德俄相互保證條約，有效地避免了俄法過早組成同盟而對德奧造成二面夾擊的威脅 (Liddell-Hart, 1972: 31)。

(二) 觀望

所謂的「觀望」，本文定義為是出於趨利的動機，對於體系的變動，及修正與現狀維持二股勢力，均保持距離但謹慎觀察。雖然通常是非武裝中立或武裝中立的方式來實施。重要的是，此時的策略動機是試圖找出最適當的介入時機，以便能在加入優勢的一方，進而從中獲利。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保持中立的羅馬尼亞，便是採取觀望的策略的最好例子。由於軍備不足與國土形狀不利防禦，即便國內民意在國際衝突爆發之初，便普遍希望加入英法俄三國協約，但羅馬尼亞仍然保持觀望而不願一開始便投入戰局。直到一九一六年夏天，俄軍向奧軍防線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並成功突破奧軍防線後，羅馬尼亞才與協約國結盟，向奧匈帝國邊境進攻。³⁰

另一例是一四五三年鄂圖曼土耳其對君士坦丁堡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圍城時，威尼斯保持中立。威尼斯保持中立的理由，主要是當時東地中海貿易的中心已經從拜占庭帝國(Byzantine)首都君士坦丁堡移往埃及亞歷山大城，而且與土耳其之間尚有自一四三〇年薩羅尼加(Salonica，目前的希臘第二大城帖薩羅尼加(Thessalonica)，位於馬其頓進入希臘的交界，自羅馬時期便是馬其頓屬省的首府)攻防戰後，已簽訂多年的友好通商條約。貿然加入戰局，不但沒有好處，風險也太高：協助拜占庭者，勢必與當時已經佔據大部分巴爾幹半島的土耳其正面衝突，而且君士坦丁堡的商業貿易重要性，已經逐漸被亞歷山大城所取代；也不能再仿效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與法蘭西騎士合作推翻拜占庭帝

³⁰ 事實證明俄軍的攻勢表面上雖然看起來成功，但就整體現實而言上，對俄國卻是無法彌補的大災難。俄軍擄獲德奧俘虜三十五萬人、誘使羅馬尼亞參戰、迫使德軍從西線抽調出七個精銳德軍師前往東線阻止俄軍，也迫使德國參謀本部放棄原定將在索穆河對英軍陣地發動的大規模反攻計畫，看似成功。但俄軍戰損達一百萬餘人，最後更引發國內革命而造成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崩解。羅馬尼亞也在參戰後短短三個月，就被德奧聯軍徹底擊敗(Liddell-Hart, 1972: chs.10,13)。

國一般，協助土耳其攻打君士坦丁堡，會得罪西歐各國與教廷自不待言，與土耳其合作的結果，將有可能使威尼斯在地中海的殖民與商業據點，受到土耳其的威脅。在上述的認知下，身為當時地中海海上第一強權而有能力從韃靼尼爾海峽切斷土耳其兵員補給的威尼斯選擇保持觀望，除通知駐克里特島防衛艦隊保持警戒並承諾給予資金援助外，只派遣少量人員以志願軍身分前往君士坦丁堡助戰的主因 (Lane, 1973: 198-199, 234-238, 247, 303, 348-349, 356, 358-359, 361, 381)。

(三) 平衡

所謂的「平衡」，本文定義為單獨或與現狀偏好國家結盟、合作，對危險國家進行抑制與對抗，以維持體系的既有現狀。文所謂的「平衡」，與Walt的平衡概念較為相近，但仍有差距。Walt提出威脅平衡理論時，把平衡定義為是「於其他行為者合作來對抗優勢的威脅」 (Walt, 1987: 17)，本文提出的危險平衡理論的平衡策略，指的是「與其他現狀偏好的國家行為者合作來抑制危險國家，以便能維持體系既有的現狀」。簡單來說，平衡策略的判準，是其維持現狀的目的，而與對體系現狀造成不穩定甚至是失衡威脅的危險國家對抗的行為策略考量。

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七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西班牙、皮特蒙(Piedmont)、托斯卡尼(Tuscany)、那不勒斯(Naples)、若干日耳曼邦均加入企圖維持歐洲原有的專制體系的普奧反法同盟，來抑制法國的反專制思想與實質的軍事擴張，便是採取平衡策略 (Schroeder, 1994b: 120-121)。

另外一例便是俄國與法國於一八九一年八月組成的法俄協約，此一著名的法俄協約在一八九二年成為法俄軍事同盟，而且其同盟內容是對德奧義的三國同盟具有「指向性敵意」的一法俄約定只要三國同盟中的任何一國開始動員者，法俄應立即動員加以應對。與Waltz的理解不同，法俄協約並不是針對一八七九年的德奧同盟而來的，而是針對輔即位的德皇在前一年(即一八九〇年)一改由俾斯麥主導的親俄政策，拒絕續簽德俄相互保證條約的輕率行為而來的。換言之，三國同盟是以俄法為對象的攻守同盟，而且同盟實力已然遠遠超越俄法

個別國力，且德國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便是以孤立法國為其西歐基本策略，又於一八九〇年廢除德俄相互保證條約，致使法俄一方面無法向德奧義靠攏，另一方面與又是緊鄰著強大的軍事同盟，法俄會展開穩固的同盟，自屬必然。此外，英國雖然在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多次因為殖民利益—特別是南非問題—而與德國保持友好甚至是讓步，但德國多次對英國進行武嚇與要脅，以及德國海軍軍力的擴張，終於迫使英國在一九〇一年英德協商破裂後，向法俄同盟靠攏，以便能在未來可能的危機中，以集體的力量來抑制三國同盟的蠢動，亦屬於平衡策略的典型（Liddell-Hart, 1972：36-46）。

	British	Germany	France	Russia	Austria	Italy
MILPER	281	524	605	871	315	265
MILEX	29742	28276	37244	34531	13455	13827
ENERGY	149040	77190	36618	11844	19836	4123
IRST	7520	4100	1900	1010	920	10
UPOP	11419	5991	4575	4461	2545	2782
TPOP	37802	49762	38350	118565	43006	30295

圖二：1891年歐洲主要國家國力比較表 (Schweller, 1998: 77-78)

(四) 躲避

所謂的「躲避」(Hiding)，本文定義為是與危險國家保持距離，既不與現狀維持國家結盟以避免招致危險國家的先制攻擊，更不依附危險國家以避免先被攻擊。躲避策略通常以非武裝中立實施，雖然外觀上與「觀望」近似，但躲避的動機不在趨利而找尋投入衝突的時機，而是單純希望能遠離衝突與危險而已。

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七年法國革命戰爭期間，威尼斯共和國在法國與奧國雙方爭取之下，始終堅守中立，不願涉入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甚至到法軍藉著追擊奧軍而侵入威尼斯北義本土而對各主要城市進行實質佔領時，威尼斯始終不願意與法軍採取正面對抗的態勢，也不願意與奧國合作夾擊法軍。威尼斯在此一階段便是採取躲避的策略，期待等到法奧間衝突結束後，法軍能退出威尼斯北義本土（塩野七生，1980：ch.14）。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前，明知德國如果進攻法國，必然會侵入

荷蘭與比利時國土，荷蘭與比利時仍堅守中立至德軍壓境，也是躲避策略的典型。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羅馬尼亞就與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七年的威尼斯以及一九一四年的荷蘭與比利時不同，雖然外觀上看起來都是保持中立不加入戰局，威尼斯是自始至終不願意介入歐洲本土的混亂，即使法軍已然侵入其領土，也不願意與法國正面衝突，比利時與荷蘭也是在德軍已然展開戰爭動員，仍不願意與德國為敵。但羅馬尼亞卻在保持中立的同時，已然準備加入協約國，只是在等待並尋找適當的參戰時機而已 (Liddell-Hart, 1972: ch.13)。

(五) 屈從

所謂的「屈從」(Capitulating)，本文定義為國家行為者在無法採取躲藏策略而與危險國家保持距離，特別是受到危險國家的威脅時，既無理單獨對抗而又未能即時獲得其他國家有力的協助支援，從而試圖透過適當的實質奉獻—例如領土的讓與、天然資源、人力或技術的提供、或通行權利的承諾等等，一方面解消危險國家更大的敵意與更大規模的侵奪，一方面又能對損害進行較主動的控制。

一四三〇年威尼斯在與土耳其於薩羅尼加攻防戰中首次交手而敗戰後，與土耳其簽訂友好通商條約，以薩羅尼加城換取土耳其境內全面通商自由及愛琴海各基地主權的承認，便屬於此一典型。以領土換取通商貿易自由的保有，自此成為威尼斯共和國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間近二百五十年的土耳其政策的主要基線，而鄂圖曼土耳其一手優勢軍力對威尼斯於地中海各領地進行局部而有限的攻擊，一手以地中海貿易通商來逼迫威尼斯做出讓步，也成為土耳其對威尼斯策略的主軸。

做為以轉口貿易為經濟命脈的威尼斯，在土耳其連續的、直接的但有限的優勢攻擊下，不得不多次以海外殖民地主權來換取賴以生存的轉口貿易航路的通暢。當時的西歐各國與當代歷史學家都認為威尼斯十足是唯利是圖、叛教背友的惡德商人集團，等於是在對威尼斯外觀上趨利依附於基督教世界共同的宗教、政治與軍事外敵—土耳其—的行為，採取輕蔑與批判的態度。但是這對於

以東西轉口貿易做為國家經濟命脈的威尼斯的立場來看，只能說是一種形勢比人強時的無奈與悲哀。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被威脅者在經濟上差別地依賴危險國家，而危險國家一方面以有限度的軍事或政治動作進行壓迫，一方面以經濟利益引誘，「棍子跟蘿蔔」的二手策略的適當操作當可增加被威脅者屈服的內在與外在壓力，更能迫使被威脅者採取屈從策略。

另一例是法國與奧國在一七九七年的關係。一七九七年在奧軍被法軍擊敗而求和後，法奧簽訂的坎波福米奧和約(The Peace of Campo Formio)，和約的主要內容是法國取得比利時，奧國則獲得原威尼斯共和國領地為補償。論者多有認為奧國此時成為法國的同盟夥伴，似乎是依附到當時顛覆歐洲原有體系制度的危險國家—法國（李則芬，1995：237）。但是，法國遠征埃及的艦隊隨後在一七九八年的英法尼羅河口海戰中，遭英國艦隊殲滅後，奧國便迅即與英國、那不勒斯、俄國與土耳其共組第二次反法同盟，並立即積極向法國發動攻勢(Fuller, 1956: 372)。因此，奧國並沒有在一七九七年依附法國，而是以放棄早已被法國佔領達二年之久的比利時做為條件，來向當時已經攻入奧國核心的法國屈服，避免奧國被法國全面佔領而滅亡的最壞下場。

（六）對抗

所謂的「對抗」(Confronting)，本文定義為國家行為者無法採取躲藏策略，也無法透過有條件的奉獻來滿足危險國家，為了維持自我國家生存，所採取的直接對抗危險國家的策略。

此一策略選擇的例子眾多。一六四五年土耳其突襲威尼斯所屬位於愛琴海與地中海重要樞紐的克里特島，威尼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³¹，單獨傾全國之力在克里特島與土耳其周旋達二十五年之久。一六六八年(即首府坎地亞長達二十三年的攻防戰結束的前一年)威尼斯大使向教皇克萊門特九世說明克里特島戰況時指出，當年威尼斯支應坎地亞(Candia)攻防戰的年花費便高達439萬2千達卡特，而威尼斯當年的年稅收卻只有300萬達卡特多一點而已。³² 簡言之，威尼

³¹ 當時歐洲各國仍忙於三十年戰爭的進行與戰後重建，且地中海政治經濟地位重要性已然降低，西歐各國政府無意也無暇來協助。

³² 「達卡特」是威尼斯於一二八四年鑄造發行的金幣，重量是3.56公克，與佛羅倫斯於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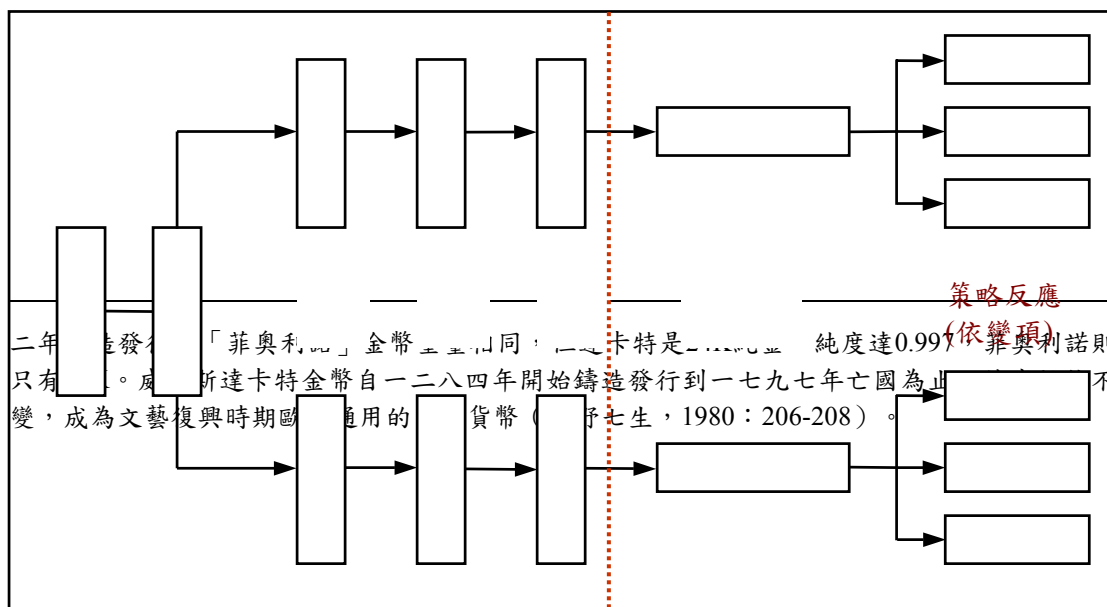
斯孤軍抗戰二十五年後，已然處於山窮水盡的境地（塩野七生，1980：336-337）。威尼斯之所以選擇長期抗戰的原因，在於除了正在遭土耳其蹂躪的克里特島外，威尼斯已經沒有土地可以拿來貢獻而滿足土耳其永不滿足的胃口了，而雙方多次接觸之所以無法達成和議，主要也正是因为土耳其堅持威尼斯必須放棄克里特島主權。

一七九二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面對擁有優勢兵力的普奧同盟，一片混亂的法國也決定以前所未有的全國總動員方式，採取積極對抗的策略。一九三七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中國也是面對日本在東北、華北的無限制擴張，才決定一改之前的屈從策略，採取積極的對抗態勢。塞爾維亞在一九一四年面對奧國的動員與宣戰，亦不得不在七月二十六日也開始動員而進入作戰的準備。一九一四年比利時拒絕接受德國要求放棄中立並提供通行權利的最後通牒，並於德國侵入時展開激烈的抵抗。一九四〇年荷蘭與比利時在面對德國的優勢攻擊時，也是採取對抗的策略。

五、結論—趨利與避禍動機雙軌策略反應

透過上述歷史案例的觀察可知，影響到國家行為者的策略選擇反應的重要解釋變項，乃是風險/危險程度的高低；個別國家行為者將體系變動視為風險或危險的差別，取決於個別國家在變動過程中所抱持的行為動機；而個別國家在同一變動過程中之所以會抱持不同的行為動機，趨利或是避禍，在於其在體系變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據此提出一個用以描述、解釋甚至是預測國家策略反應的理論模型：



以趨利為動機而認知到體系變動風險程度低時所採取的「依附」策略指標，即未直接受到危險國家的攻擊或威脅，而與危險國家合作甚至是結盟，協助危險國家來共同對其他國家進行攻擊或威脅，甚至是共同對體系既有秩序進行調整的行為。認知到體系變動風險程度中等時所採取的「觀望」策略指標，即未直接受到危險國家的攻擊或威脅，而既不與危險國家合作，也不協助被攻擊或威脅國家，也不與其他決定介入衝突的國家——不論是採取協助危險國家或協助被攻擊國家——合作的行為，通常是以武裝或非武裝中立的態度來呈現。認知到體系變動風險程度高時所採取的「平衡」策略的行為指標，即未直接受到危險國家的攻擊或威脅，但卻以協助被攻擊國家或其他偏好現狀國家方式，來共同抑制或抵抗或打擊危險國家，以維持體系既有秩序穩定的行為。

以避禍為動機而認知到受危險國家攻擊或威脅的危險程度低時所採取的「躲避」策略指標，即雖感受到危險國家的威脅，仍採取不與危險國家敵對但也不與危險國家合作的行為。通常是以武裝或非武裝中立的態度來呈現，因此行為外觀上與「觀望」策略是相同的，但其動機與內涵則是完全不同。認知到受危險國家攻擊或威脅的危險程度中等時所採取的「屈從」策略指標，即因為攻擊無法避免，且無法有效抑制或抵抗，而以主動或被動提供實質資源或同意去做或不做特定行為的方式，來解消危險國家進一步攻擊或侵奪的行為。通常是以內容條件不平等而具有權利讓與性質的和約方式來呈現。認知到受危險國家攻擊或威脅的危險程度高時所採取的「對抗」策略指標，即受到直接攻擊或威脅而無法避免，而且無法有效透過提供資源或其他承諾的方式來解消危險國家全面的、無限制的攻擊與侵奪時，為了自我生存的維持，所採取的積極對抗行

為。

透過對於眾多歷史案例的初步檢視，本文提出的理論模型確實似乎能解釋眾多歷史變動，但為了要進一步驗證本文提出的趨利/避禍動機雙軌策略反應模型的效用性，更全面且更細緻的歷史案例觀察分析是必要的。這也是作者在本文提出的同時，已然進行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 Alker, Hayward R. 1996. "Political Methodology, Old and New." in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1990.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19-922.
- Fuller, J. F. C. 1956.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 Vol.3. 2001, London: Cassell & Co.
- Holsti, K. J. 198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5th. London: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 Keohane, Robert O. 1986.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ray, Sidney Verba, and Robert O. Keohane.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ne, Frederic C. 197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ddell-Hart, B. H. 1967. *Strategy*. 2nd Revised. London: Faber & Faber Co.
- . 1972.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 Co.
- . 1970.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Rye Field Company.
- McClelland, John S. 1998.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Inc.
- Nye, Joseph S. 1993. "The Shadow of the Past: Learning from History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aking." in Tetlock, Philip E., Jo. L. Husbands, Robert Jervis, Paul C. Stern, and Charles Tilly eds. *Behavior,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 Peters, Les. 1997. *Timeline to the Great War, 1870~1917*. in

- http://raven.cc.ukans.edu/~kansite/ww_one/timeline/timeline.htm November 2, 2002.
- Reiter, Dan. 1996.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osecrance, Richard N. 2003. "Is There A Balance of Power." in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 Rosecrance, Richard N., and Chih-Chen Lo. 1996. "Balancing,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479-500.
- Schroeder, Paul W. 1990. "Napoleon's Foreign Policy: A Crimi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4,2: 147.
- . 1992. "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3: 683.
- . 1994a.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4b.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08-148.
- . 1997.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 Use or Abuse, but Fit of Mis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 頁碼?
- . 2003.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72-107.
- . 1998. *Deadly Imbal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David J. 2002. Correlates of War. in <http://www.umich.edu/~cowproj/dataset.html> July 16, 2002.
- Snidal, Duncan. 1986. "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Oye, Kenneth A.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squez, John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d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899-912.
- . 2003. "The New Debate on Balancing Power." in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2: 275-316.
- . 1997.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31-935.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st. New York: McGraw Hill, Inc.
- .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H.W. Wilson - SSA]* 91,4: 913.
- 李則芬。1995。《中外戰爭全史 第九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吳九龍編。1990。《孫子校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塩野七生。1980。《海の都の物語—ヴェネツィアの共和国の一千
年》。東京：中央公論社。

Death or Survival, Existence or Extinction

—Strategic Reactions of State Actors

Yi-Lan Chu*

The strategic reactions of state-actors in the systemic turmoil is one of the core research themes of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ance of power theories represented by Kenneth N. Waltz's version and critics hence become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Interestingly, relevant theories in discussing state-actors' strategic reactions, usually originated from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nd designated to explain or even predict certain social historical events, are all in certain degree having the difficulty in explaining or predicting the actual outcomes of other historical events.

The things that have already come to pass cannot be wrong, but th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to them can be.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the author attempts boldly in asserting a revisionist balance theory based on the re-examination of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major assertions of the theory proposed by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while with the motive of *profit-seeking*, state-actors will take the *Bandwagon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low degree of risk, will take the *Spectat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medium degree of risk, and will take the *Balanc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high degree of risk; while with the motive of *damage-avoiding*, states-actors will take the *Hid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low degree of danger, will take the *Capitulat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medium degree of danger, and will take the *Confronting* strategy in facing a high degree of danger.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hreat, balance of interest, strategic reaction, balance, bandwagon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